

晚清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交流互動 ——以《海關醫報》為中心

吳青* 林江峰**

摘要 晚清赫德主管海關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推動《海關醫報》的刊行。對赫德而言，為在華外國居民提供衛生資訊、推動海關制度建設與社會衛生事業發展，均是推動《海關醫報》出版的主要考慮。《海關醫報》的成功刊行，使赫德以行政命令要求各海關醫員按期提交醫學報告。在此背景下，粵海關醫員將其與博濟醫院互動的見聞記於醫學報告。雙方的互動具體表現為提供醫療筆記、探討病因、醫務協助三個方面。雙方的頻繁互動主要基於共同地理、文化環境，並夾雜着職業情誼的聯繫。這種交流互動，既能使粵海關醫員有足夠的醫療材料撰寫《海關醫報》，又能緩解博濟醫院人力缺乏的壓力，可謂互惠之舉。

關鍵詞 《海關醫報》；博濟醫院；粵海關醫員；赫德

引言

近代來粵的西醫群體中，有諸如醫學傳教士、執業西醫、軍醫等人，而醫學傳教士則是其中人數最多、影響力最大、涉及面最廣的群體。因此，學界大多關注醫學傳教士以及教會醫院的相關活動，¹或着重探析教會醫院的時空佈局、建築特點。²然而，晚清時期在廣東行醫的西方醫務人員中，還有一批受僱於政府的粵海關醫員。他們在負責口岸的衛生檢疫的同時，常與以博濟醫院為首的教會醫院進行醫務往來。當時的《海關醫報》就記載了諸多粵海關醫員和博濟醫院交流互動的情況，但目前學界對此的關注並不充分。³因此，本文以《海關醫報》為中心，探討赫德創辦《海關醫報》的緣由，並進一步分析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交流互動情況、原因與影響。

一、赫德與《海關醫報》的創刊

1869年，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收到一封來自江海關醫官哲瑪森（R. A. Jamieson）的信，信上的內容引起了他的興趣。哲瑪森在信中闡述了關於利用已有的海關資源，收集並定期出版有關中國港口城市疾病資訊的想法。哲瑪森曾任《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編輯，返回英國後於都柏林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869年被赫德任命為江海關的醫學顧問。⁴原先做過主編又轉入醫學工作的哲瑪森以報刊編輯的眼光，建議赫德刊行海關港口衛生資訊，這其中的緣由值得探究。

外國傳教士在華傳教十分注重印刷出版工作，中國近代的報刊很多是由傳教士引進創辦的。外國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是《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到1860年，外國教會在中國出版的報刊已達32份，數量是鴉片戰爭前的一倍。⁵當時的傳教士經常在期刊發表介紹中國歷史、地理和風俗的文章。其中，由

* 吳青，哲學博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 林江峰，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美國傳教士創辦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是最突出的一份刊物。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在該報的創刊詞中，闡述了其辦刊目的是要注意外國出版書籍對中國的評論，不僅要關注中國的氣候、溫差、風向變化、雨量、土壤的健康程度、礦物等自然環境資訊，而且還要對商業、社會關係等任何感興趣的話題發起調查。⁶

當然，傳教士除了利用報刊收集中國歷史文化信息，他們也將期刊作為傳播西醫、普及醫藥的媒介。1836年，伯駕 (Peter Parker) 將廣州眼科醫局的資金來源、診斷制度、治療醫案、人數統計發表在《中國叢報》上，⁷ 以供其他人參考和借鑑。隨後，不少醫學傳教士在綜合刊物上發表醫學資訊。例如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創辦的《教會新報》(*Church News*)，無不談及醫學常識，並曾刊登過〈皮膚諸症論〉〈西醫舉隅〉等文章。⁸ 刊物之間的報告討論使得分散在中國沿海各地的西醫能加強聯繫，起到相互交流的作用。

時任江海關醫官的哲瑪森敏銳地捕捉到報刊可作為醫學交流的媒介，便積極向赫德進言。哲瑪森曾於1863至1865年擔任《北華捷報》的主編，當時的《北華捷報》以消息靈通、重視言論著稱，⁹ 他對報刊作為傳遞資訊的重要媒介功能自然不會陌生。十九世紀以來，國際交通與貿易日益興盛，在國際間行駛的船隻容易攜帶外來疾病。《北華捷報》就曾報導停泊在港口的船隻因存在大量疾病患者，繼而引發霍亂的事例。¹⁰ 因此，海關成為觀察國際間流行疾病的一個窗口，使得海關醫生有機會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流行病症。為此，哲瑪森便寫信建議赫德利用海關的環境及資源，收集港口城市的疾病資訊。¹¹

那麼，赫德如何看待哲瑪森的提議呢？從1870年第19號總稅務司通令來看，赫德對哲瑪森的提議是大為讚賞的，並稱該計劃的施行，將“對中國和英國的醫學界以及廣大公眾都非常有用”。¹² 赫德對《海關醫報》的出版有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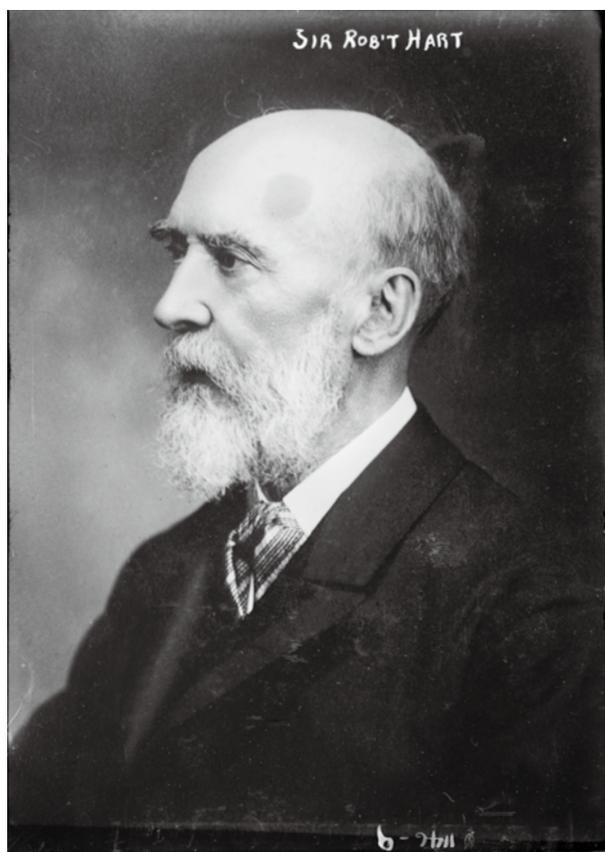


圖1. 赫德爵士，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藏，複製編號：LC-DIG-ggbain-05772。(圖片來源：hdl.loc.gov/loc.pnp/ggbain.05772)

的一番思慮。從赫德個人視角出發，他早年並不適應中國的氣候與水土，尤其是初到寧波擔任翻譯領事的時期。赫德在其日記中不斷抱怨中國的氣候，認為由這裡的環境所引起的疾病將使人“躺倒在這片塵埃中”。¹³ 赫德自稱初到寧波居住的幾年間，身體沒有一個小時能獲得真正的健康，¹⁴ 他甚至染上可怕的瘧疾。¹⁵ 瑪高溫 (D. J. Macgowan) 就曾在《中國叢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寧波盛行的疾病主要有瘧疾、風濕等，¹⁶ 同一時期的外國人，也多因患病而回國調養。¹⁷ 從中可知，當時外國人因氣候、風土、疾病等因素，一時難以適應中國環境的情況，可謂司空見慣。赫德知道，若能藉此分析那些引起疾病的因素，介紹中國氣候對初來者的影響，以及提出在華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項，

文史研究

對外國居民來說無疑是有益處的。¹⁸

從海關總稅務司的角度來看，赫德有推動海關改革與建設的目標。赫德在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一職時，曾在其日記寫下七點工作方針，包括“必須知道有關中國人、沿海省份”更多的情況和弄清西方文明的成果中“哪些對中國最為有利”。¹⁹此時，西方已建立起海港檢疫制度，而中國的海關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缺乏系統的檢疫規章。海關作為管理各國船隻來往的機構，調查通商口岸常見的流行病，無疑有利於港口檢疫的施行。西方社會在建立殖民霸權的過程中，會將本土的公共衛生舉措和防疫機制移入到殖民地，以應對流行病的挑戰。²⁰同時，赫德雖是中國的海關官員，但他也是英國在華利益的代表。在華外國人的身體健康與否，是事關列強在華利益的重要問題；殖民地的高級官員照顧旅居的僑民則是對帝國應盡的義務。因此，通過海關收集當地常見、少見、特殊疾病的資訊，以供英國醫學界分析，無疑能使外國居民了解在中國生活的注意事項，進而更好地在中國發展事業。正如後來整理《海關醫報》的戈登（Charles Alexander Gordon）所說：

港口外國居民健康狀況的評論很有價值。駐港醫務人員對生活習慣、運動、體操等方面的觀察值得特別注意。²¹

因此，哲瑪森的提議得到了赫德的支持。1870年12月，海關總稅務司署以赫德的名義公佈了第19號通令，要求各海關醫員每半年提交一次醫學報告。

赫德出版《海關醫報》的宗旨不僅是為了調查中國的疾病詳細情況，還旨在推動“中國和英國醫學界”的發展。當然，受益的不僅是醫學群體，這更是有益於整個社會。中國的海關分佈在南北東西相距數千英里的地方，氣候與地理特徵各不同。毫無疑問，《海關醫報》為研究和觀察各種流行病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窗口。

《海關醫報》刊行後，赫德自然在意人們的反應如何。正如赫德心中所期待的，該刊的反響很好。赫德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對《海關醫報》成功創辦的喜悅和自豪，並深信它將會發展為一流的醫學刊物，填補西方對東方的認知不足。²²不少學者十分重視這些醫學報告的價值，例如1873年《海關醫報》刊行之初，上海的《北華捷報》就轉載了漢口立德醫生（Dr. Reid）編撰的醫學報告內容，稱其“醫學報告引起了讀者極大的興趣”。²³隨後，《北華捷報》又多次刊印《海關醫報》的相關資訊給大眾瀏覽。醫學界亦時常翻閱在《海關醫報》上發表的論文，以獲取有關中國流行疾病的資訊，並藉此解答疑惑。例如，在汕頭福音醫院工作的高似蘭（Cousland）在治療腳氣病時，就閱讀了西蒙醫生（Dr. Simmon）發表在第19期《海關醫報》的文章，稱“它消除了我對這次腳氣病發病性質的所有疑惑”。²⁴可見，《海關醫報》的確受到讀者和醫學界相關人士的歡迎，也說明赫德的計劃獲得了成功。

此外，《海關醫報》還作為海關出版物對外銷售。1881年，總稅務司署將海關出版物劃分為統計、特種、雜項、公務、辦公等六類。其中，統計、特刊、雜項可以對大眾銷售。《海關醫報》雖然屬於特種系列，但亦在銷售名單之列。除了部分被贈送予人及留在造冊處外，其餘海關出版品會被送往上海、香港、日本、倫敦等地區銷售。²⁵這使得《海關醫報》可在國際上流通，不少歐美學校、醫院、圖書館等機構都能目睹西方醫學人員在東亞的觀察研究。其內容甚至得到了醫學權威刊物《柳葉刀》（*The Lancet*）的認可，以及一些國際流行病書刊、報告的引用。可見，《海關醫報》無疑成為了東西方醫學交流的窗口，正如赫德所設想的，《海關醫報》理應成為人類事業“普遍的福祉”。²⁶

赫德會對定期提供有價值的論文的海關醫生予以讚賞，²⁷同時，他亦發現有部分醫員未能如期提供通商口岸的疾病資訊。於是，他便不斷發表通令以示提醒。他告訴各港口醫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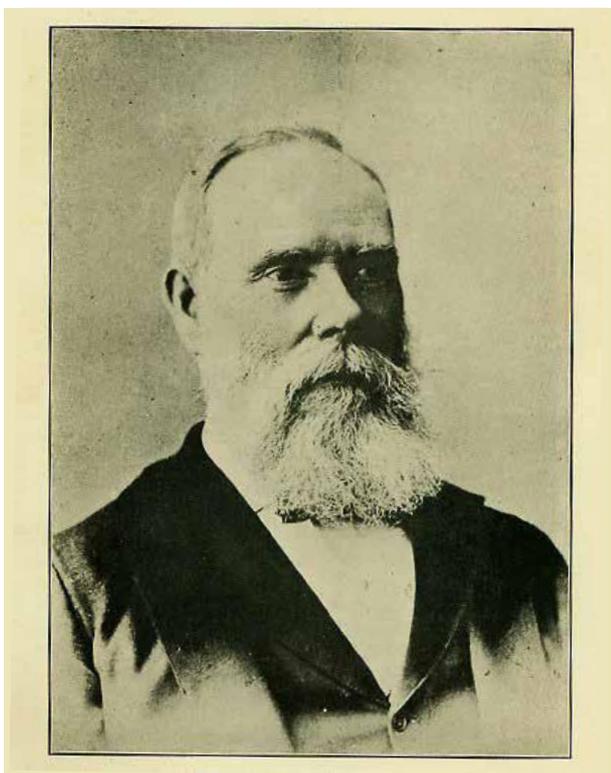


圖 2. 嘉約翰 (圖片來源: SydneyKLewis. *John Glasgow Ker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r._John_Glasgow_Kerr.jpg>)

若因港口居民健康狀況良好而沒有相關的疾病材料時，則“歡迎任何關於醫學或外科主題的專著”。²⁸ 面對總稅務司提出“有益衛生事業”的構想，部分海關醫員不願只被動充當報告的提供者，而是希望成為積極尋找疾病材料的主動者，特別是粵海關醫員。他們在與博濟醫院進行醫務往來的同時，將自己的醫療見聞記錄於醫學報告中，為《海關醫報》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二、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合作互動

粵海關醫員在廣州的教會醫院中，醫務交流最多的當屬博濟醫院 (Canton Hospital)。據不完全統計，在粵海關醫員上交的有關廣州情況的 29 次《海關醫報》中，曾提及“博濟醫院”或“嘉約翰” (John

Glasgow Kerr) 的地方達 13 處。在十九世紀後期，博濟醫院是廣州最有影響力的醫院，更被公認為近代西醫入華源頭。博濟醫院的前身，是由美國醫學傳教士伯駕於 1835 年在廣州十三行新豆欄街開設的專治眼科的醫局。在伯駕的主持下，醫局逐漸形成一定規模。1855 年，伯駕返回美國，醫院後來被轉交到嘉約翰之手。其後，嘉約翰主持博濟醫院業務近半世紀之久，與博濟醫院的聯繫十分密切。²⁹

嘉約翰於 1824 年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他在醫學院畢業後曾在美國行醫一段時間。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嘉約翰接受美北長老會的任命，來到廣州眼科醫局行醫。後來，位於十三行的眼科醫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焚毀，嘉約翰便在廣州南郊增沙街覓得一處店面，經過一番裝修，醫院於 1859 年重新開業，並正式取名為“博濟醫院”。後為拓展博濟醫院的業務，嘉約翰於 1866 年在穀埠 (今仁濟路) 建造了新的醫院。至此，博濟醫院的地址再也沒有變動過。嘉約翰主持博濟醫院期間，曾翻譯書籍 34 部，治療的門診病人達 740,324 人次，膀胱結石手術就做了 1,234 例，培養三年制以及低於三年制的學生共 150 人次。³⁰

從專業的角度上來看，嘉約翰是一位優秀的醫生，他在廣州的醫療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醫學經驗，並記錄了許多病例的資訊。不少粵海關醫員從嘉約翰處採集資料，以便進一步報告當地的醫療情況。粵海關醫務官黃寬在起草廣州海關的第一次醫報內容時，認為膀胱結石在廣東極為常見。為更好展現廣東地區膀胱結石病症的面貌，黃寬從博濟醫院獲取了結石手術病人的相關資訊。從博濟醫院的報告中可知，膀胱結石手術數量逐年增加：1869 年為 35 例；1870 年達到 49 例；1856 至 1870 年中，博濟醫院共有 217 例患者接受了手術。黃寬將這 217 例患者按照地域、職業進行細分，發現這些患者來自 23 個區域，8 類不同的職業，³¹ 這為各海關的醫務官對廣東結石病的地區分佈及職業研究提供了證據，而這些資料正是出自嘉約翰基於治療膀胱結石的醫療實踐所做的筆記。

文史研究

除了提供醫療筆記之外，嘉約翰還會與粵海關醫員探討病因。前文已述，赫德創辦醫報的初心是收集中國的疾病資訊，特別是關於麻風病。在各地海關初次提交醫報時，如漢口、廈門等地的醫員亦有報告當地的麻風病案例。黃寬也依照赫德通令的要求，報告了廣州的麻風病情況，並認為麻風病在當地居民中是較為普遍的。一些麻風病患者曾到博濟醫院求診，博濟醫院通常會用砷或者碘化汞砷溶液治療輕度麻風病患者，長期使用這種藥物後，許多病人的情況都有所改善。報告亦稱教會醫院會用砒霜治療輕度的麻風病患者，³² 還記錄了黃寬和嘉約翰曾對麻風病的病因和治療情況進行探討，但他們對此都難有滿意的結論。³³

除了麻風病，黃寬還與嘉約翰探討過華南地區是否有利於肺結核患者居住。當時的西醫十分注重氣候環境對西方人罹患肺結核的潛在影響。³⁴ 黃寬一方面認為熱帶氣候本身就會使肺結核患者身體虛弱，加之夏季氣候高溫多雨，使患者無法在戶外運動，會加速肺結核的過程；³⁵ 另一方面，他在觀察了廣州的肺結核病情況後，認為廣州的肺結核患者並不如歐美那麼普遍。針對這個問題，黃寬查看了傳教士藥房的統計資料，但“因為中國人總是喜歡用他們自己的醫學系統來治療內科疾病，只把一小部分這樣的病例帶到外國醫生的面前”，於是他又詢問了在廣州行醫多年的嘉約翰對肺結核在廣州是否流行的看法。嘉約翰也認為中國雖然有肺結核患者，但絕不像在歐洲或美國那樣普遍。

粵海關醫員亦會前往博濟醫院觀察病人的病症，並記錄於醫報當中。黃寬在起草 1872 年 9 月的廣州地區醫報時，發現中國居民出現普遍的斑疹熱，其症狀是間歇性的發燒，並伴隨着傷寒。黃寬從中國醫生的記錄本中了解到對此類疾病逐日發熱症候的描述，得知此病十分嚴重：患者“發熱八或十天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病情就會變得很棘手，兩日或三日後，就幾乎沒有救治的希望”。黃寬又記錄了他在博濟醫院曾目睹一例斑疹熱病例呈持續發

燒的特點，四肢有強烈的發熱和疼痛，脈搏為 130。³⁶ 該病人在 14 天後死亡，情況與中國醫生的觀察相符。對於斑疹熱的死亡率，他認為應在 10% 至 20% 之間，但由於病人經常延遲就醫，故死亡率可達 40%。³⁷

博濟醫院偶爾還會邀請粵海關醫生參與醫院的日常工作，如凌爾醫生 (B. Stewart Ringer) 就時常被博濟醫院邀請參與手術會診。他曾把一次在博濟醫院進行的、從恥骨上切開尿結石的手術記錄於 1897 年的《海關醫報》中。凌爾醫生稱該手術非常成功，他從患者身上取出了重達 11.5 盎司的結石，但不幸的是，患者很早便離開了醫院，他的傷口在回鄉的過程中裂開，及後開始發燒和腸道出血，最終於兩周後死亡。凌爾醫生認為“如果他在醫院裡安靜地多呆一會兒，直到傷口變得更加牢固”，就會康復得很好。³⁸

當博濟醫院缺乏人手時，醫院亦會請粵海關醫生來救治病人。魏樂思醫生 (J. F. Wales) 在 1887 年 4 月至 1888 年 3 月的《海關醫報》中提到，因嘉約翰不在，他被請到博濟醫院幫忙診治一名女孩。這名十歲的女孩在七日前被一頭水牛用角撞傷，傷口在肚臍左側幾英寸的地方，裡面的胃脾網膜十分突出。魏樂思先用硼酸清洗，並在擴大傷口後試圖將突出的部分放回原處，接着再縫合傷口。手術過程十分順利，雖然女孩當晚的體溫曾上升至華氏 100 度（約攝氏 37.78 度），但體溫在第二天便恢復正常，且沒有其他不良症狀。³⁹ 其實在此手術之前，魏樂思醫生就已經和博濟醫院保持緊密的聯繫。1883 年 12 月 30 日，一名 33 歲的中國男子因罹患膀胱結石而住院，在此之前他已經忍受了 14 年的病痛折磨。入院僅幾小時後，這名男子便死於急性膀胱炎。魏樂思隨後前往博濟醫院對這名男子進行屍檢，並解剖出長 3.125 英寸，寬 2.5 英寸，重量達 10.25 盎司的結石。⁴⁰ 實際上在十九世紀的廣州，醫院要對中國男子進行屍檢並不容易，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死者的家屬不願意讓病人的屍體支離破碎。博濟醫院在

開設解剖學教育時，因無法進行人體解剖，只能用狗給醫學班的學生上解剖學課程。⁴¹因此，在博濟醫院中進行屍體解剖的機會十分難得，而醫院將屍檢交給魏樂思主持，這對於魏樂思而言是一種寶貴的支持。

博濟醫院在感謝海關醫生幫辦醫務的同時，還會給海關醫員提供當地居民的流行病資料。例如魏樂思在報告 1888 年 4 月至 1889 年 3 月廣州港口的流行傳染病及治療情況時，就使用了嘉約翰的筆記。據嘉約翰的觀察，夏季廣州及其周圍地區流行霍亂，造成大量人員死亡，但它並不是惡性的；在秋季流行的疾病則是痢疾和瘧疾，亦造成大量人員死亡。嘉約翰認為夏季氣候不利於健康，因此他會在夏季盡可能地避免在醫院進行手術，⁴²以防流行疫病傳染到醫院中。⁴³

三、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互動之因

為何粵海關醫員會與博濟醫院交流互動，並從中獲得當地居民和外國人的相關疾病材料？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毗鄰的社交生活

當時，在廣州居住的外國人口數量有限，他們日益形成穩定的社交圈子。1837 年，《中國叢報》對僑居廣州的外國人口進行調查，發現廣州有 307 名外籍人士，其中歐美人有 213 人，約佔外籍人口的 70%。⁴⁴然而，在其後的三四十年間，外國人的數量並沒有隨時間發展而快速增長。1871 年，黃寬曾對僑居廣州的外國人口進行統計，發現除航運人口外，廣州的外國居民約為 180 人，⁴⁵其中涵蓋傳教士、商人、領事及海關工作人員等。

1861 年，沙面成為英、法兩國的租界地，僑居廣州的外國人多居住在沙面租界。不久，廣州租界當局禁止華人入住沙面，⁴⁶外國人只能依靠傭人、廚師作為他們與陌生的中國社會進行交流的媒介。因為語言的差異，外國居民

難以與他們的中國傭人交流；⁴⁷同時，外國居民對中國人亦存在思想隔閡，他們認為中國居民是“不可同化的人”。⁴⁸例如，前述的醫學傳教士瑪高溫曾提出“一切人都是兄弟”的主張，但他私下卻稱自己並不會與白人以外的人進行親密交往。⁴⁹至於利用信件與外界交流，則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當時通商口岸的郵件船運並不頻繁，大約一個月才能收到他人的來信，因此在廣州生活的外國人與外界近乎隔絕。

若外國居民想在廣州擁有社交生活，語言相近的歐美人是彼此更加容易親近的對象，尤其是醫學傳教士。對於這些異鄉人而言，中國的氣候、水土一時難以適應，十分容易罹患疾病，這時就亟需外國醫師的救治。由傳教士開設的博濟醫院緩解了不少外國居民的病痛之苦，因此外國居民亦常常捐款支持。⁵⁰粵海關醫員的職責是為海關工作人員提供醫療服務，“凡是領取海關工資並在任何海關轄區休假或執勤的人，都有權獲得該轄區醫務人員的醫療服務”。⁵¹海關工作人員多以洋員為主，因而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醫生在為外國居民提供醫療服務的過程中，能有共同的話題。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粵海關醫務所和博濟醫院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1860 年，粵海關稅務司以珠江北岸為中心，建造起兩層簡陋的樓房作為辦公大樓，粵海關醫務所便附設於此。粵海關公署大樓的西邊是外國租借地沙面，海關工作人員居住的關員宿舍，則位於沙面大街 2、4、6 號附近。博濟醫院的院址位於粵海關大樓以東，距離不到一公里的仁濟路上。故粵海關醫員從海關大樓出發，步行到博濟醫院只需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因此，只要海關醫生願意去博濟醫院探訪，很快便可抵達。交通上的便捷，也在無形當中拉近了海關醫生和博濟醫院人員交流的距離。

（二）海關醫員工作內容的轉變

海關醫員的工作內容之一是為海關職員提

文史研究

供醫療勤務服務，診治港口患病船員。⁵² 總稅務司署於 1870 年發表關於監測口岸流行病況的通令，要求每半年出版一期《海關醫報》，這就促使海關醫員要調查當地的公共衛生狀況、特殊疾病、流行病及療法。然而，當時的海關醫生大多是西方人，他們會受到語言、經驗等方面的限制，難以與中國人打交道。⁵³ 另一方面，教會醫院的醫療傳教士們來華之初或之前便會學習漢語，以方便與病人交流病情，減少因翻譯所帶來的溝通誤差。⁵⁴ 故掌握當地最豐富的疾病資訊的機構，莫過於教會醫院，其為海關醫生撰寫《海關醫報》提供了翔實的素材。

晚清以降，西方各國派遣醫學傳教士到中國，並陸續在通商口岸建立起教會醫院。這使得教會醫院成為西方醫學在華輸出的主要力量。教會醫院對平民大眾的治療是免費的，而且還樂於分發藥品，因此吸引了許多貧困的病人前來求醫問藥。⁵⁵ 病患在看病的過程中，會領取標有號數的竹牌，按照先後次序到醫生處看病，醫生將就診病人的資訊記錄在案，如姓名、病症、就診時間等。這樣做的目的是能在病人下次複診時了解上次的診治情況，給予新的治療意見。⁵⁶

不僅記下病症和採用的治療方法，還要記下病人的省份和由個人生活歷史形成的習慣及其他細節。這樣的記錄本最終將成為有指導意義的珍貴文獻，譬如將使我們能夠直窺中國社會和家庭生活的最深處。⁵⁷

這些資訊為醫學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特別是對醫生了解疾病發生的情況，以及傳播衛生觀念，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同時，海關醫員的工作量較執業醫生要少得多，這使得海關醫員有機會去教會醫院交流實踐。海關醫員診治的病人數量約為每半年 200 至 500 人不等，而教會醫院在幾日間就能超過這個數額。⁵⁸ 海關醫員的工作還包括對申

請加入海關的候選人進行身體檢查，並按時提交海關人員因病離開港口的疾病報告，⁵⁹ 但這些工作並不會佔用太多時間，他們的私人活動時間是比較充裕的。如時任台灣打狗關醫務官的曼森（Manson）在完成官方職責之外，每日都去當地的傳教士醫院觀察。同時，曼森還開設了私人診所，為歐洲人和中國人服務，生意日漸發達。因此，曼森在任醫務官的第三年就已經能償還他之前學習醫學的費用。⁶⁰

每個口岸的海關醫員薪資略有不同，大多與海關社區的規模大小掛鉤。粵海關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海關僱員人數多，社區規模大，因而粵海關醫員的月薪比其他港口要多，大約為 125 海關兩（約 41 英鎊）。⁶¹ 整體而言，粵海關醫員的工作相對輕鬆，因此醫員有餘力到博濟醫院進行醫務交流，以及調查當地社區的公共衛生狀況。

（三）海關醫員地位特殊

1864 年，赫德頒佈《海關應弘揚之精神、應遵循之方針與應履行之職責之思考及諸專項規定》，這是中國海關僱用外籍人員的第一個管理辦法。當時剛成立不久的“洋關”外籍工作人員緊缺，赫德因此寫信向各地駐華公使求助，希望挑選年富力強的人員加入海關，⁶² 其中就不乏傳教士群體。赫德十分重視傳教士群體，並說：“我喜歡錄用傳教士的後代。”⁶³ 早在 1863 年，赫德在設立海關醫務所之初，就招攬了不少醫學傳教士進入海關工作，他自信地認為：

一個具有傳教精神的人在我們海關，他面前將有一個令人驚歎的天地，而且會派上非常大的用場。⁶⁴

赫德之所以重視讓傳教士加入海關，除了是受其本人的基督教思想影響外，還因為他意識到傳教士是來華最早和活動時間最長的群體，熟悉中文及了解中國社會是他們的優勢。從醫學方面來看，中國此時的西醫教育仍處於



圖3. 愛丁堡大學內的黃寬雕像（圖片來源：Ggiganti. Wong Fun Statu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ong_Fun_statue.jpg>）

起步階段，尚未出現大量的西醫人才，而醫學傳教士則是將西醫和西藥技術引進中國的重要群體。赫德在尚未擔任海關總稅務司時，就曾多次與醫學傳教士往來，並支持醫學傳教士在華的醫學活動。⁶⁵可見，赫德讓醫學傳教士擔任海關醫員是基於現實情況和他個人觀念的雙重考慮。

同時，在海關任職的醫員具有較大的獨立性。他們除了能在海關醫務所任職，還可於其他醫療機構兼職。有的醫員會自行開設診所，還有的會在教會醫院工作。總稅務司署對醫務官兼職的情況予以包容和認可，並認為海關醫員的“地位與那些不允許做其他事情的受薪僱員的地位不太一樣”。⁶⁶當然，海關醫員的職位只能在口岸生效，若離開港口，則“其任命就會同時失效”。⁶⁷這樣限制醫員的活動範圍，是要求海關醫員時刻為外籍人員及其家屬提供醫療服務。此外，海關醫務所並不提供醫藥，藥品得由海關醫生自行提供。⁶⁸因而，海關醫

員私下行醫、自行開業，從而獲取資金作為補助的做法“已經得到承認”，⁶⁹也並無太大的限制。有的粵海關醫員就是聘請自博濟醫院的傳教醫師，還有的醫員在博濟醫院任職。其中，黃寬、計羅（F. Carrow）、魏樂思等人在擔任海關醫生之前，就和博濟醫院有着密切的聯繫。

黃寬從英國留學返回廣州之前，就已和博濟醫院淵源頗深。1841年，伯駕前往愛丁堡大學進行訪問並發表演說，希望“激起基督教傳教會內，他專門致力的部門中的朋友們的興趣”。⁷⁰這在愛丁堡大學激起醫學傳教的思潮，愛丁堡醫學傳教會就此成立。愛丁堡醫學傳教會試圖向亞洲國家派遣傳教士，希望藉着提供醫療服務，達到寓教於醫的目的；不久又提出“利用部分資金資助一或幾位學生的專業教育，為他們進入傳教會後服務做準備”的決議。黃寬在愛丁堡學習期間就得到過該會共97英鎊2先令6便士的資助，⁷¹自然不會對該會的創建脈絡感到陌生。由於嘉約翰與伯駕同屬廣州醫藥傳道會的成員，嘉約翰時常邀請黃寬來博濟醫院當助手，黃寬也自然樂意幫忙。⁷²與此同時，因黃寬在愛丁堡學習時，主要攻讀病理學和解剖學，⁷³故嘉約翰又聘用黃寬傳授解剖學、內科學和外科學的知識。⁷⁴

計羅在擔任粵海關醫生之前，是美北長老會的醫學傳教士。1876年，嘉約翰因身體原因，返回美國休養。此時，博濟醫院由同屬美北長老會的計羅掌管。計羅在博濟醫院任院長期間，曾完成相當複雜的卵巢切除手術。及後粵海關醫生黃寬因病離世，計羅就成為黃寬的繼任者，任粵海關醫員。⁷⁵除黃寬、計羅曾在博濟醫院工作外，同為粵海關醫員的魏樂思醫生也管理過博濟醫院。1883年，嘉約翰再次因健康問題前往香港休養，當時的博濟醫院被委託給賴馬西（Mary W. Niles）、老譚約瑟（Joseph Thomson）和魏樂思三人共同管理。⁷⁶

從中不難看出，粵海關醫員的日常生活與博濟醫院存在交集。《海關醫報》記載粵海關

文史研究

醫員到博濟醫院觀察病例、協助手術、從嘉約翰處獲取流行病資訊等經歷，都是他們在同一區域內因職務往來所呈現的結果。

赫德提出“有益衛生事業”的構想，推動《海關醫報》的刊行，無疑為他贏得寶貴的名聲，“即使是現代歷史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也要感謝哲瑪森醫生和赫德爵士所建立的事業”。⁷⁷這些被發表在《海關醫報》的醫學論文，不僅引起醫學界人員的關注，同時也吸引了非醫學界讀者的興趣。不少即將前往中國工作的外國人從中了解到當地的氣候、公共衛生環境，以及生活的注意事項。

赫德自上而下敦促海關醫員定期提交醫學報告，不少海關醫員意識到醫學報告的重要性，認為這“將在幾年內構成一部完整的中國醫學史”。⁷⁸由於部分海關醫員是由醫學傳教士兼任，使得醫學傳教士調查中國疾病與赫德“為大眾謀福利”的構想具有一致性。他們積極利用教會醫院資料，總結報告期內的居民總體健康情況，分析疾病與氣候變化等的關係，並撰寫成報告發表在《海關醫報》當中。

然而，並非所有的醫務官都按期提交醫學報告，部分海關醫員認為沒有發現足夠新穎的內容來證明撰寫文章的必要性，⁷⁹從而喪失撰寫報告的信心。

在海上還是在岸上都沒有人死亡，而且生病的情況也很少，從醫學的角度來說也沒有甚麼意義。⁸⁰

還有一些海關醫員初來口岸，對地方社會情況暫不熟悉，暫未打通與當地居民的聯繫，故而缺乏當地居民疾病資料，導致醫學報告內容相對匱乏。⁸¹相較之下，粵海關醫員以共同的地域、社交生活、職務、情誼等為紐帶，從博濟醫院獲得廣州居民的疾病情況，既能應對總稅務司對提交醫學報告的要求，又能在“報告中體現出寶貴的病理學和歷史資訊”；⁸²博濟醫院也因海關醫員的幫忙，緩解了人手緊張

的壓力。故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醫務往來，可稱得上是互惠之舉。

結語

刊行《海關醫報》的建議，最初雖由地方醫官提出，但赫德的推動無疑是至關重要的。這個提議既符合在華外國居民的健康利益，又滿足了醫學界對中國罕見疾病的調查。《海關醫報》的成功創辦，不僅有益於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同時也給赫德帶來良好的名聲。英國自1879年以後，曾多次授予勳章嘉獎赫德，⁸³這無疑是對赫德在華事業的肯定。當然，《海關醫報》並非赫德一人的成果，而是由眾多海關醫員提供港口衛生狀況、流行傳染病記載，或是醫員行醫實踐的案例報告而成。如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進行醫學交流時，會將醫療實踐寫在醫療報告中，分享自己在華的醫學見聞。

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的交流互動主要基於兩大因素：一是他們處於共同地理、文化環境，這些在沙面居住的外國人形成了穩定的社交圈；同時，粵海關醫員的辦公地點和博濟醫院的距離不到一公里，因地理便捷和有共同的話題，於是便增加了雙方交流的可能。二是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存在職業情誼的聯繫，海關醫員為海關服務的同時，亦被允許兼任他職。粵海關醫生黃寬、計羅等就曾在博濟醫院任職一段時間。他們利用博濟醫院的資料，觀察當地流行病情況，並記錄在《海關醫報》當中。二者的交往互動，可視為海關醫員與地方教會醫院往來的一個縮影。⁸⁴這種交流互動既包括醫務協助，亦包括醫學知識的傳遞。部分醫員因初入海關，未能深入了解地方社會，導致醫學報告未能反映當地居民流行病特徵。與此相比，粵海關醫員與博濟醫院進行交流合作，從而獲取廣州衛生情況的記載，無疑是積極有益的選擇。

附：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傳統醫學疫情防控史料收集、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0&ZD222）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註釋：

- 關注廣州醫學傳教士和醫院創辦活動的相關論著頗豐，如專著有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對十八世紀來粵東印度公司醫生和伯駕、黃寬等有詳細研究，參見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論文如譚約瑟、楊宇平：〈博濟醫院的結石手術〉，《中醫典籍與文化》，第1期（2021），頁241-259；陳小卡：〈嘉惠霖與他在中國的醫學事業〉，《嶺南文史》，第2期（2013），頁48-53；李計籌：〈廣州博濟醫學堂與近代中國西醫教育〉，《西北醫學教育》，第4期（2015），頁667-670；郭強、李計籌：〈廣州博濟醫院的經費來源研究〉，《醫學與哲學》，第10期（2018），頁94-97；等等。
- 教會醫院的相關研究有張春陽、孫冰：〈廣州近代醫院建築發展研究初探〉，《南方建築》，第1期（2017），頁100-107；劉桂奇：〈近代城市醫院的空間佈局及演化——以廣州市為例〉，《熱帶地理》，第3期（2010），頁327-332；劉桂奇：〈近代廣州醫院時空分佈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期（2010），頁56-66；郭強、李計籌：〈近代廣東教會醫院的創辦及時空分佈〉，《宗教學研究》，第2期（2014），頁236-244；王雪君、李志平：〈近代廣東教會醫院的歷史示範作用〉，《黑龍江檔案》，第5期（2017），頁118-119；等等。
- 在既有的研究中，學者多重視《海關醫報》的地區疾病醫療，較少深入探究赫德創立《海關醫報》的動機。參見楊祥銀、王少陽：〈《海關醫報》與近代溫州的疾病〉，《浙江學刊》，第4期（2012），頁67-72；佳宏偉：〈清末雲南商埠的氣候環境、疾病與醫療衛生——基於《海關醫報》的分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5），頁117-128。較早注意到海關醫員與教會醫院互動的是李文巍的〈晚清閩海關醫員與福州教會醫院〉，該文簡要提到閩海關醫員與福州教會醫院的資金、人事、醫務之間的流動，但未能具體呈現出海關醫生與教會醫院交流往來與背後的原因，參見李文巍：〈晚清閩海關醫員與福州教會醫院〉，《黑龍江史志》，第21期（2013），頁324-325。在粵海關醫員研究方面，學界關注焦點是黃寬。如張大慶利用檔案資料補充粵海關醫員黃寬在愛丁堡大學求學的费用來源；蘇精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對粵海關醫員黃寬生平活動進行拓展，運用詳盡的資料廓清黃寬與倫敦會之間的關係，並對黃寬行醫生涯進行評價，參見張大慶：〈黃寬研究補正〉，《中國科技史雜誌》，第1期（2011），頁105-110；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中西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156-188。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vol. 55, no. 1460, 26 July 1895, p. 2.
- 方漢奇：《中國近代期刊史（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9。
-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1832, pp. 2-5.
- Parker, Peter.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irst quarterly report, from the 4th of November 1835 to the 4th of February 183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1836, pp. 461-472.
-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68。
- 張功臣：《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1840—1949》，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頁16。
- The North-China Herald*, vol. 9, no. 419, 7 August 1858, p. 2.
- Wang, K. Jimin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397.
- 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1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327。
- (美)凱瑟琳·F·布魯納等編，傅曾仁等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18。
- (美)凱瑟琳·F·布魯納等編，傅曾仁等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168。
- (美)凱瑟琳·F·布魯納等編，傅曾仁等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103。
- Macgowan, Daniel Jerome. "Report of the Ningpo Missionary Hospital, to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1846, pp. 343-344.
- (美)凱瑟琳·F·布魯納等編，傅曾仁等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138。
- Hart, Robert.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 no.19 of 1870." *Medical Reports*, no. 1, 1871, p. 4.
- (美)理查德·J·司馬富等編，陳絳譯：《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1863—1866》，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頁61-62。

文史研究

20. 劉遠明：《西醫東漸與中國近代醫療體制化》，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9年，頁158。
21. Gordon, Charles Alexander. "Introductory Remarks." *An Epitome of the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s to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from 1871 to 1882*, Bailliere, 1884, p. 15.
22. Hart, Robert et al.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10. 轉引自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中西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184。
23.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vol. 10, no. 315, 17 May 1873, p. 3.
24. (英) 吳威凜等著，朱文平編譯：《汕頭福音醫院年度報告編譯 1866—1948》下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81。
25. 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1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246-247。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5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329。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1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643。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6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76。
29.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48。
30. (美) 嘉惠霖、瓊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14。
31. "Dr. F. Wa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s*, no. 2, p. 71.
32. "Dr. F. Wa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s*, no. 2, p. 72.
33. "Dr. F. Wa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s*, no. 2, p. 71.
34. 李恒俊：〈醫學觀念與種族偏見：十九世紀來華西醫對中國肺癆問題的調查研究〉，《史林》，第3期(2018)，頁139-146。
35. "Dr. F. Wo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3." *Medical Reports*, no. 6, p. 50.
36. "Dr. F. Wo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2." *Medical Reports*, no. 4, pp. 70-71.
37. "Dr. F. Wo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2." *Medical Reports*, no. 4, pp. 70-71.
38. "Dr. B. Stewart Ringer'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97." *Medical Reports*, no. 53, pp. 27-28.
39. "Dr. J. F. Wales'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8." *Medical Reports*, no. 35, p. 28.
40. "Dr. J. F. Wales'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4." *Medical Reports*, no. 27, p. 7.
41. Wang, K. Jimin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393.
42. "Dr. J. F. Wales'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9." *Medical Reports*, no. 37, p. 7.
43. "Dr. J. F. Wales'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9." *Medical Reports*, no. 37, p. 7.
44. "Name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1837, p. 432.
45. "Dr. F. Wan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s*, no. 2, p. 70.
46.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298。
47. (美) 凱瑟琳·F·布魯納等編，傅曾仁等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88。
48. (美) 埃德加·斯諾：〈廣州沙面——外國人的至聖所〉，劉力群主編：《斯諾通訊特寫選》，重慶：新華出版社，1985年，頁88。
49. (美) 凱瑟琳·F·布魯納等編，傅曾仁等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77。
50. Wang, K. Jimin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401.
51.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4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125。
52. Wang, K. Jimin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396.
53. "Dr. E. I. Scott'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wat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6." *Medical Reports*, no. 12, p. 20.
 54. (美) 嘉惠霖、瓊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69。
 55. "Dr. E. A. Aldridg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oih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1." *Medical Reports*, no. 21,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 73.
 56. (美) 嘉惠霖、瓊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48。
 57. (美) 嘉惠霖、瓊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69。
 58. 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中西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 184。
 59.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4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 125。
 60. Wang, K. Jimin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396.
 61.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7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 450。《清代貨幣金融史稿》第307頁記載，1873年海關兩兌英鎊的匯率為6先令8便士左右，即1英鎊為3海關兩。其後銀價偶有變動，此處以1873年為基準。參見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頁 307。粵海關醫員的年薪可達412英鎊，比醫學傳教士的年薪要高。當時的單身醫學傳教士年薪為150英鎊，結婚則提升至250英鎊。故海關醫員的工作與醫學傳教士相比，可謂事少錢多。醫學傳教士的年薪參見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中西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 169。
 62. (美) 理查德·J·司馬富等編，陳絳譯：《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頁 149。
 63. (美) 丁韋良著，沈弘等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 281。
 64. (美) 理查德·J·司馬富等編，陳絳譯：《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頁 148。
 65. (美) 理查德·J·司馬富等編，陳絳譯：《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頁 239。
 66.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7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 450。
 67.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2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 264。
 68.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7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 450。
 69.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總稅務司通令》第7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2年，頁 450。
 70. (美) 嘉惠霖、瓊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80。
 71. 張大慶利用愛丁堡相關檔案材料，發現黃寬在英留學期間的生活與學業費用除了有香港方面的資助外，還有愛丁堡醫藥傳教會提供資金援助。詳見張大慶：〈黃寬研究補正〉，《中國科技史雜誌》，第1期（2011），頁 105-110。黃寬是這項補助款的第二位受益人，他在獲得愛丁堡補助款計劃的幾個月後，來自香港的贊助款就中斷了。詳見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 161-162。
 72. 1866年10月博濟醫院新建大樓完成後，嘉約翰開辦醫學校，便請黃寬、關韜等擔任教學工作。參見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 185。
 73. 黃寬在愛丁堡醫學院求學時，他的老師都是名望極高的教授，如解剖學教授是細胞學先驅古德塞（John Goodsir）；外科學教授是愛丁堡皇家醫院主治醫師米勒（James Miller）；婦產科醫學是發明氯仿麻醉手術的辛普森（James Y. Simpson）。黃寬的學習成績良好，每門都在B以上。其校友韓雅各（James Henderson）稱黃寬在校表現傑出，在與眾多同學參與的三項競賽中，曾獲得兩項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詳見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 159-160。
 74. 1866年10月，博濟醫院新建大樓完成後，嘉約翰隨即開辦醫學院，聘請黃寬、關韜等擔任教學工作。參見蘇精：〈黃寬的西醫生涯與文化夾縫〉，《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 185。

文史研究

75. Wang, K. Jimin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406.
76. (美) 嘉惠霖、瓊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47。
77. Wang, K. J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399.
78. "Dr. J. R. Somervill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Pagoda Anchorage)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s*, no. 2, p. 24.
79. 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2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140。
80. "Dr. J. R. Somervill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Pagoda Anchorage),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5." *Medical Reports*, no. 9, p. 50.
81. "Dr. A. R. Platt'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Seven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1876." *Medical Reports*, no. 11, p. 11.
82. Wang, K. Jimin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399.
83. (美) 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506。
84. 如瓊海關醫員藉助教會醫院疾病材料，報告當地流行病情況。參見 "Dr. E. A. Aldridg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oih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1." *Medical Reports*, no. 21, p. 74.

